

中国文艺论战

李何林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艺论战

李何林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2 字数 246,000

1984 年 4 月第 1 版 198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100

统一书号: 10094·479 定价: 2.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出版于1930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为向研究中国新文学运动者提供资料，故予重印。并由编者写了《重印说明》。付印前，本社参阅有关资料，作了校勘，改正了原版中的一些错误。

目 次

重印《中国文艺论战》说明·····	(1)
原版序言·····	(10)
革命与知识阶级·····	画 室 (13)

语丝派及其他

“醉眼”中的朦胧·····	鲁 迅 (21)
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侍 桁 (27)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鲁 迅 (37)
革命文学问题	
——对于革命文学的一点商榷·····	冰 禅 (42)
拉杂一篇答李初梨君·····	甘 人 (56)
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	郁达夫 (68)
文艺与革命·····	冬 芬 鲁 迅 (72)
中国新文艺的将来与其自己的认识·····	甘 人 (80)
又是个 Don Quixote 的乱舞·····	侍 桁 (86)
个人主义的文学及其他·····	侍 桁 (93)
从时代说到无产文学·····	高 明 (98)
一个读者对于无产文学家的要求·····	少 仙 (100)
关于革命文学·····	青 见 (102)
革命广告·····	郁达夫 (104)
附：鲁迅附记·····	鲁 迅 (105)

关于革命文学·····	冬 芬	(108)
否定的否定·····	白 木	(112)
考证法·····	白 木	(114)
两位革文家·····	白 木	(115)
路·····	鲁 迅	(116)
文艺漫笔·····	定 奂	(118)
从伤兵想到革命文学家·····	风 苞	(120)
通信·····	徐 匀 鲁 迅	(124)
杂记一则·····	无名氏	(128)

创造社及其他

请看我们中国的 Don Quixote 的乱舞

——答鲁迅《“醉眼”中的 朦胧》·····李初梨 (133)

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

——革命文学底根本问题底考察·····克 兴 (145)

文艺战上的封建余孽

——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杜 荃 (157)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成仿吾 (166)

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

——评矛盾君底《从牯岭到东京》·····克 兴 (172)

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冯乃超 (187)

什么是“健康”与“尊严”

——《新月的态度》底批评·····彭 康 (205)

非个人主义的文学·····黄药眠 (214)

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李初梨 (219)

无产阶级艺术论·····忻启介 (225)

艺术家当面的任务

- 检讨《检讨马克思主文阶级艺术论》……谷 荫 (230)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成仿吾 (238)
桌子的跳舞……郭沫若 (245)

小说月报及其他

- 从牯岭到东京……茅 盾 (259)
革命文学的内包……祭 心 (275)
读《倪焕之》……茅 盾 (278)

新月

- 文学与革命……梁实秋 (299)
《新月》的态度……新月社 (309)

现代文化及其他

- 革命文学评价……莫孟明 (319)
革命文学论的批判……谦 弟 (325)
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谬误……尹 若 (336)
检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艺术论
——批评忻启介君的无产阶级艺术论……柳 絮 (342)
艺术的理论斗争
——答《畸形》的谷荫君……柳 絮 (347)

重印《中国文艺论战》说明

1929年编辑这本书，1930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至今五十二三年了；我也由二十五六岁到了七十八九岁的年龄。鲁迅是不悔其少作的，我的“少编”就更不必悔了；因为我不过只写了一千多字的《序言》（现在看来似乎还没有原则性的大错误），其余都是各派的文章。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们认为这些五十多年前的原始资料还有参考价值，其中有一些还极难找到，要重印这本书，并要我写一点重印的“说明”，我就写在下面。

我如果现在有时间，根据这些原始材料，把那次“论战”的内容和经过写一篇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评价，供读者参考，是比较好的。但我现在的工作情况不允许我这样做。好在我在此书出版十年后编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二编里已有较详细的论述，可供参考；不过四十多年前的论述，难免有不恰当的地方。

1926和1927年，我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家乡安徽霍邱县，又参加了地下党活动。在脱离中国实际的盲动主义领导下，1928年夏我参加了一次“暴动”；既暴露了身份，就不能不逃走（随即被安徽反动政府通缉），逃到了唯一可以避难的鲁迅先生组织领导的北平“未名社”。那时鲁迅虽已去南方两年多，但“未名社”的六人中有

四人都是我的霍邱县小同乡：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曹靖华是河南人，当时在苏联）。后二人还是我在安徽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因为同受“五四”时代进步思想的影响，有了友谊，早已不是泛泛的同乡同学的关系。他们接受了我的避难，供给我食住；这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素园患肺结核住西山病院，静农作点小事，李、韦都还是在校学生，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而且他们当时担当的政治风险已是很大的：霁野、丛芜在我到北平的前两个月，因出版一本禁书被北洋军阀逮捕坐牢刚刚释放出来，现又隐藏一个暴动后被通缉的共产党，实在冒着不小的风险。但他们毫不迟疑地让我住下去，素园在病床上还为我的生活操心，我不得不改名为“李竹年”（取自《竹书纪年》），又取了一个“李何林”的笔名。

在“未名社”共住了八九个月，我不能不帮他们做些工作，就把他们的校对、印刷、发行工作接过来一部分，使他们能有较多的时间做我所不能做的工作；当时霁野、丛芜在燕京大学还没毕业。大约在我到北平后的一个多月，和我同在家乡参加暴动逃到上海的王青士、王冶秋兄弟因生活无着，也来到北平。冶秋不久找到了工作，青士也被“未名社”接受下来，和我一样工作。这时“未名社”成立了“出版部”，从景山东街西老胡同一号迁到景山东街四十号，并且在门外挂出了“未名社出版部”六个大字的牌子。有东西两个院子，房屋比西老胡同的大一倍多，就在一进街门的东院三间北房里设立了新文艺书刊门市部，除出售“未名社”出版的六位成员的译著和《莽原》、《未名》两个期刊外，还和上海等地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交换代售新文艺书刊。青士能画画，他所画的曹靖华译的《烟

袋》封面和《坟》、《朝华夕拾》、《穷人》等书的广告画挂在街门外的墙上，很吸引了一些读者进来买书或看书。他终日乐哈哈的乐观的笑容令我至今不忘。可惜他在1931年1月代表青岛市委到上海参加地下党会议时，和“左联”五位青年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及林育南、何孟雄等十七位共产党员（连他共二十三人），因被叛徒出卖被捕，于2月7日都被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了。我之所以写下关于他的这一小段，也是为着在五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回忆往事，不得不引起的怀念和哀悼！

1928年，正是“革命文学”问题论战的时候，“未名社”的门市部既然和上海等地书店交换代售新文艺书刊，我就不费一文钱并且很方便地阅读了各派的论辩文章。又由于从“五四”以来我就对于“文言白话”、“新旧文学”之争，“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之争，很感兴趣；对“革命文学”问题之争，也很感兴趣。又觉得这一次论争的问题很重要，表现了文艺界的思想理论水平提高了不少，提出的问题多是“五四”以来没有提出过的。我想：能有象我这样方便的机会大致阅读了这些论辩文章（自然还有我未看到的）的人，恐怕不多，何不编辑起来印给愿看的人们看一看，也给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留下一点资料呢？于是就剪贴抄录，编成了这一本。

鲁迅的译著，除“未名社”出版的少数几本（《坟》、《朝华夕拾》、《出了象牙之塔》、《苦闷的象征》、《小约翰》）外，当时多半都由北新书局（先设北京，后移上海）出版；我想这一本“论战”和鲁迅有关，它该是愿意印的吧？于是写了《序言》寄去，很快就出版了，比现在印这样一本学术性资料书快得多。我接着又编了一本《鲁迅论》，也在1930年

4月印出了。

我在这本“论战”的《序言》的最后一段里说：“我觉得画室（冯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那时不叫知识分子），对于这一次中国文艺界所起的波动以及知识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上所处的地位，都下一个持平而中肯的论判，实在是一篇这一次论战的很公平的结语；现在就把这一篇不分派别的排在前面，作为这个论战的导言或者结论，以介绍给读者——虽然有人说画室是与‘语丝派’一般人颇接近的。”请读者研究一下画室的这一篇文章大致是不是公平？

为着纪念和怀念雪峰同志，我谈一谈现在对他这篇文章的体会，不一定正确或准确。

全文分三段：“一、知识阶级的动摇”，论述中国革命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进入以工农为主体的土地革命的激烈斗争时期，知识分子面对这样的革命遂发生了动摇，除“甘心反动的知识阶级”以外，分化为以下的三种人：

“其一，他决然毅然的反过来，毫不痛惜地弃去个人主义的立场，投入社会主义，以同样的坚信和断然的勇猛去毁灭旧的文化与其所依赖的社会。其二，他也承受革命，向往革命，但他同时又反顾旧的，依恋旧的；而他又怀疑自己的反顾和依恋，也怀疑自己的承受与向往，结局他徘徊着，苦痛着——这种人感受性比较锐敏，尊重自己的内心生活也比别人深些。……第三种人，……即所谓投机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段里他还说：

“知识阶级虽不属于革命的主要力量，——知识阶级于其构成上不能作革命的主要力量，但革命没有特别看轻知识阶级的必要。”这是针对创造社、太阳社攻击鲁迅说的，但轻视“知识

阶级”的思想到现在有些人还有。对于当时知识分子的四大类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三种人”加“反动的”，共四大类）。

全文的“二、中国革命的现阶段”，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向知识分子提出的要求。“到了‘五四运动’的时期，国民解放运动积极地开始进行着与封建势力的必要的斗争。……第一次的认识了社会的阶级冲突。……自‘五卅’以后，国民主要（次要当然继续与封建势力斗争）是应该生活在工农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的，事实上，国民解放运动到现在仍丝毫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也就证明了工农阶级没有解放以前国民解放是做不到的。中国工农的党，从最初就站在这样的主张上，虽经过几次政策的改变，然后确定了目下的政策，但只是政策的改变。在这几个的阶段间，中国知识阶级做工做得最好的，就只与封建势力斗争的一段上。……看鲁迅的《坟》，则中国的最初的晨星似的文艺运动已认识这个任务了。”但他又说，知识阶级与封建势力斗争，“若固定着站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是不成功的，这事实是真的”。面对着“大革命”后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国的知识阶级……除了一部分本已站在工农的立场上……以外，……其余……最多也不过偶尔辽远地瞥一眼无产阶级罢了”。于是，“工农的党采取了现在的手段，知识阶级才仿佛被火焰和刀光所验了似地动摇起来”。这是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的激烈斗争中经不起考验，就动摇分化了。这也符合“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的实际。

全文的“三、追随的途中”，论述“革命是只将革命的知识阶级看作‘追随者’”。“对于以上所说的第二种人”（雪

峰当时把鲁迅看作第二种人，现在看应是第一种人），革命不要“无益地击死他们”。“因此，我对于目下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底抨击鲁迅一事，倒想略加一点意见”：

在“五四”“五卅”期间，知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的是鲁迅；但他没有在创作上暗示出“国民性”与“人间黑暗”是和经济制度有关的，在批评上，对于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在旁边的说话者。所以鲁迅是理性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者。到了现在，鲁迅做的工作是继续与封建势力斗争，也仍立在向来的立场上，同时他常常反顾人道主义。但是，反顾人道主义并非十分坏的事情。革命在它的手段上，因为必要，抛弃了人道主义；但是在理想上，革命是无论如何都不肯抛弃彻底的人道主义的。同样，革命也必须欢迎与封建势力继续斗争的一切友方的势力；革命自己也必须与封建势力继续斗争的。

除了“他没有在创作上暗示出……和经济制度有关”，可以研究以外（因为有些作品是暗示了），尤其是最后一句，既符合鲁迅的实际，也符合中国革命的要求。在1928年以前，鲁迅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的的工作是都做了的，主要是反封建。创造社、太阳社提倡的“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怎么能对“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做工做得最好的鲁迅”先开刀，并且集中力量攻击鲁迅呢？所以画室说：

创造社改变了方向，倾向到革命来，这是十分好的事；但他们没有改变向来的狭小的团体主义的精神，这却是十分要不得的。一本大杂志有半本是攻击鲁迅的文章，在别的许多地方是大书着“创造社”的字样，而这只是为要抬出创造社来。对于鲁迅的攻击，在革命的现阶段的态度上既是可不必，而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的

攻击方法，还含有别的危险性。革命现在对于知识阶级的要求，是至少使知识阶级承认革命。但我们在鲁迅的言行里完全找不出诋毁整个革命的痕迹来，他至多嘲笑了革命文学的运动（他也并没有嘲笑革命文学的本身），嘲笑了追随者中的个人的言动；而一定要说他这就是诋毁革命，“中伤”革命，这对于革命是有利的吗？而且不是可笑吗？对于一切的恶意的诋毁者，为防御自己起见，革命要毫不犹豫地击死他们；革命也正不必遮瞒一切；但将不是诋毁革命者强要当作诋毁者，是只有害处没有益处的。革命有给与知识阶级的革命追随者以极少限度的闲暇，使他们多多渗透革命的策略与革命的精神的必要。

这是冯雪峰对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大张声势地攻击鲁迅的很中肯、很有说服力、很符合当时的革命性质和任务，以及革命的策略和精神的评判。到五十多年以后的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

创造、太阳二社通过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输入了初步的唯物史观的文艺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文艺是意识形态之一，它们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把中国文艺思想界的“为人生为社会而艺术”的思想提高了一大步，是有益的，应该肯定的。但他们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受了日本的福本和夫教授的“左”倾教条主义和苏联“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左”倾思想的影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地来搞“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又兼之搀杂着“狭小的团体主义的精神”（小集团主义的利益），在对待鲁迅这个问题上就犯了政策性的敌我不分、将友做敌的大错误。“革命文学”运动的真正敌人，应该是封建势力在文艺界的代表“鸳鸯蝴蝶派”和一切复

古守旧的文人，还有“新月派”中的买办资产阶级作家；而不是鲁迅和茅盾，为什么要从他二人头上开刀呢？所以画室劝他们要抽出时间多体会一下革命的策略和精神。

这一次“论战”的收获和经验教训是不少的，而至今还没有做出一份令人信服的总结，现在也不可能做总结。文艺界的那种宗派主义和“小团体主体的精神”有时还在起着作用，真是根深蒂固，很难改的！

本书共收了四十七篇“论”而且“战”的文章，分五大派。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语丝派及其他”里，鲁迅的五篇文章在对待“革命文学”本身和同“派”的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他并没有否定“革命文学”，“他至多嘲笑了革命文学的运动”和革命文学者的“个人的言动”；其他各人则多根本否认“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存在和产生的可能性，反对唯物史观的文学论和文学的阶级性等等。

“创造社及其他”一“派”里，论点也不一致，对鲁迅的态度也不相同。“小说月报及其他”和“新月”两派共只收了五篇文章，都是有代表性的。《新月》的这两篇，反对一切进步思想、反对工农革命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很鲜明、很反动的！这就告诉而且教育了创造、太阳二社：你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真正对象出来应战了，你们还“枪口向内”吗？

“现代文化及其他”的五篇文章，写于四、五、六月，七月以后的没有，可见他们是比较早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和“语丝派”“新月派”不同的，是它们有一些“革命的”词汇，其实是“安那其主义者的空谈”。我现在把

这次论战的十年后（1939年）我编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二编第五章第四节对于这一派的评介介绍于下，不一定正确，只供参考，免得我重写了。

四、安那其主义者的空谈

此外，在《现代文化》、《民间文化》、《文化战线》等刊物上发表关于革命文学问题文章的人，如莫孟明、谦弟、伊若、柳絮等（他们的文章均见《中国文艺论战》），在根本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或思想上，不但和“新月派”一致，而且谩骂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现出了自己的“安那其主义者”的嘴脸。因而，较之梁实秋直接痛快地说出“文学与大多数人无关”来，反提出了“无阶级的”“民众文学”的口号：“文化斗争的理论，一定要是民众的才行，如果只是一阶级的，那就错了。”这当然要比一切“阶级文学”都彻底的多，也好听的多了。而用意也不过是在反对“文学的阶级性”；现时世界里的“无阶级的民众文学”，其实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这“民众文艺”和一九三〇年以后的“大众文艺”的涵义并不相同）。与生在现在的人间，而要人人都讲“人类之爱”一样，是一样的用心和一样的可笑的！

本书《序言》末一行所感谢的秦实、易林二同志：秦实即王青士，已在前面说到了；易林，是张一林，原名张汝洛，字禅西，1926年在武昌高等师范时就是武昌市党的负责人之一，霍邱县暴动时曾任县委书记，后辗转逃到北平，常到“未名社”帮忙。全国解放后在山西大学教政治课，“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受不了折磨去世了。他的精神不死！

李何林 一九八二年九月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原版序言

虽然不能象苏联，对于文艺问题曾经党之最高机关召集全国大会讨论过，而且确定了党之一贯的文艺政策；但一九二八年的中国文艺界也曾起了一场颇剧烈的论争。

自创造社一般人嚷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以后，代表中国几个文艺集团的刊物如《语丝》、《小说月报》、《新月》……等都先后有文字发表；虽然各个的立场不同，其对创造社一般人表示反对的态度的一层则完全一致，同时创造社一般人对于他们也都一一的反攻——批评，尤以对“语丝派”一般人为尤甚。

这论争从一九二八年的春天起，足足的继续了有一年之久——现在似乎是渐渐消沉下去了——在这个时期各方所发表的论战的文字，统计不下百余篇；其中《小说月报》和《新月》的文字只在表明自己的文艺态度或稍露其对于创造社的“革命文学”的不满而已。至于以鲁迅为中心的“语丝派”则和创造社一般人立于针锋相对的地位！——也就是它们两方作成了这一次论战的两个敌对阵营的主力。

中国自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文艺界所起的波涛，除了第一次的“文言白话”“新旧文学”之争而外，这一回可以说是第二次了；这两次论争的情调虽然有些不同，但是这一次的论争在中国文艺的进程上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这是大概可以被承认的。

我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总算把这一次论争的文字统统收集在一块了；起初不过是想看一看这掀动现中国文艺的波涛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要看它的全面，所以就多方面的去找它；过去一年的《语丝》、《北新》、《小说月报》、《新月》、《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流沙》、《无轨列车》、《现代文化》、《民间文化》……等等，得朋友们的帮助都统统很全的找到了；关于这一次论战的文字也都一一的看了过去；这些文字虽不能象苏联的文艺论战的文字有系统，大家都本着那一个系统辩论下去；但以“语丝派”的冷嘲热讽，创造社一般人的宣传文字的笔调，《小说月报》的旁敲侧击，已呈论战文字的大观；我觉得这些文字一方面可以显示中国文艺进程上一个重要时期，他方面对于留心文艺的人也可以从这些文字里面知道一点中国文艺界的现形——了解这代表中国文艺界的几个主要文艺集团对于文艺究竟是怎样的态度。所以在自己一一看过了以后，就有想“叫大家都能看看”的意思；几个爱好文艺的朋友，也都有这个意见，并且叫我赶快把它们编印成书；于是就剪裁编排，成功了这一本。

不过这里所收集的也不是这一次的所谓“革命文学”和“非革命文学”文献的全数，这里收集的是与这一次论战有关的各方的“论”而且“战”的文字；凡是泛泛的一般论文艺的而不对着或影射着对方的“战”的文字，都统统割了爱——虽然是同在一个时代发表，看起来也好像是这次论战范围以内的东西。

在编排的时候，我觉得画室的《革命与知识阶级》，对于这一次中国文艺界所起的波动以及知识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上所处的地位，都下一个持平而中肯的论判，实在是一篇这